

商民运动研究 (1924—1930)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朱英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7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丛刊)

ISBN 978-7-301-16692-5

I. ①商… II. ①朱… III. ①广东革命根据地—史料—研究—1924—1930 IV. ①K262.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6183号

书 名: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著作责任者: 朱 英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奇云文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692-5/K·07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7.75印张 371千字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丛刊

总 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是报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创立于1984年的高校专门研究机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系首任所长,继任者为刘望龄、罗福惠、严昌洪三位教授,现由朱英教授任所长,章开沅教授任名誉所长。2000年,研究所被教育部评审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随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创办所刊——《近代史学刊》。

本所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首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单位。多年来,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博士和硕士,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1988年,又被批准成为当时为数甚少的首批中国近现代史国家重点学科。其后历经两次评审,现仍然是我国高等学校为数不多的中国近现代史国家重点学科之一。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另设有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其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此外,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也一直挂靠在本所。

近30年来,在教育部社科司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建立后在各个方面都不断获得迅速发展。例如科研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包括研究所迁入新址,每位研究人员都配有宽敞明亮的研究室;研究所资料中心建设每年投入数十万元;各项科研设备也日趋现代化。除此之外,研究所专职人员也从最初不到10人扩展为现今的20人,特别是一批30余岁的年轻教授和副教授,已成为

II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研究人员中的学术骨干,另还有多名兼职研究人员。这样的科研条件与人员规模,在国内高校的研究所中并不多见。与此同时,本所研究人员取得的科研成果也与日俱增;在出版方面,研究所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但并没有以“研究所丛刊”的名义推出,而是由研究者自行联系海内外出版社出版。

海峡两岸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都出版有专刊,尤其是台北近史所的专刊,已有较长的出版历史,刊行了大量受到学界重视与好评的专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刊,起步虽晚(始于2003年),出版的专著也为数不多,但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同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自然无法与研究力量十分雄厚的前述两处近代史研究所相比较,但却希望以其为榜样,尽力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形成我们的研究特色,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贡献绵薄之力。为此,在本所全体同仁的倡议之下,我们也决定出版自己的学术丛刊,并且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给予我们极大鼓励。

丛刊主要是收录华中师范大学教师撰写的学术专著,但少量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也酌情收入。凡提交丛刊的著作,由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予以审核和认定,必要时还将聘请校外专家审阅,达到规定之学术水平的著作才能纳入丛刊出版。根据出版协议和丛刊著作入选程序之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丛刊每年将推出二本学术专著。为了保证丛刊的学术水准,我们将以宁缺勿滥为原则,出版物数量并不做硬性规定。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所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丛刊能够连续不断地坚持出版,由此积少成多,滴水成河。并希望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

朱 英

2011年4月15日于武昌华中师大

目录

绪 论	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1
一	忽略商民运动研究造成的缺陷	1
二	近年来商民运动研究评介	6
三	商民运动研究的进一步扩展	14
四	本书的篇章结构及内容	17
第一章	国民党与民众运动	24
一	对民众运动的新认识	24
二	民众运动的初步开展	32
第二章	商民运动兴起的滞后	41
一	商民运动兴起滞后的原因	41
二	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	49
第三章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62
一	对待不同商人的策略	63
二	对待商人团体的策略	66
三	其他相关策略	75
四	《商民协会章程》的实施	79
第四章	商民运动的起步:以广东为例	86
一	中央商民部的设立与商民运动的起步	86
二	广东省商民部的设立与商民运动的初期发展	94
三	广东商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06
第五章	商民运动的扩展:以湖南为例	125
一	国民党湖南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25

2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二	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扩展	131
第六章	商民运动的发展:以湖北为例	148
一	湖北地区商民协会的建立	149
二	武汉地区商民运动的兴盛	165
三	国共纷争之下的武汉商民运动	184
第七章	商民运动的余波:以上海为例	211
一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	212
二	新局势下的上海商民运动	233
第八章	商民运动期间的商民协会与商会	253
一	商民协会与商会冲突的原因及表现	254
二	商民运动期间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合作	274
三	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政策的变化	283
第九章	商民运动期间的商民协会与店员工会	308
一	长沙市商民协会会所被毁案	308
二	武汉店员运动与商民协会的应对	323
三	上海商民运动中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340
第十章	商民运动的终结	352
一	上海商民协会的統一商人团体要求	352
二	国民党三全大会期间的商会存废之争	370
三	上海总商会“闭门”风潮	382
四	商民协会的取消与商民运动的结束	395
结 语		413
一	商民运动的成效	413
二	商民运动的缺陷	418
参考文献		423
后 记		432

绪论 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熟悉 1920 年代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历史的人们大都会知道,在北伐时期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党,都曾轰轰烈烈地大力开展民众运动,这也是促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走向高潮和取得一系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是,一般人了解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的民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而对同一时期的商民运动却知之甚少。

所谓商民运动,有时也称商人运动,指的是北伐前后国共两党,尤其是国民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民众运动,可以说与当时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性质相类似。商民运动的具体目标,乃是通过动员广大中小商民成立商民协会,支持和参加国民革命,同时打击和孤立反对革命的买办及大商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一时期的其他民众运动都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相关成果甚多,却唯独对商民运动缺乏探讨。查阅迄今出版的各种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几乎都看不到对商民运动的论述,即使是有关探讨国民革命史的专题著作,也同样很少提及商民运动。商民运动作为国共两党在当时开展的重要民众运动,可以说被史学研究者所遗忘,当然也就使后人无从了解。

一 忽略商民运动研究造成的缺陷

商民运动研究的付之阙如,其影响不仅仅在于导致人们对商民运

动本身缺乏了解和认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探讨 1920 年代中国历史的某些专门领域和问题,甚至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拓展也不无影响。

首先分析这一研究的缺失对近代国民党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近代史研究者都承认,研究 1840 至 1949 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国民党史是无法回避、必须予以重视的内容。不管从哪方面看,国民党与中国近代后半段历史的发展演变都紧密相联,其前身从 1905 年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到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又逐步演变成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1927 年国民党更是一跃成为执政党,统治中国大陆 20 余年。因此,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在许多相关的具体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歧见,但这并不妨碍各自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都十分重视论述国民党的发展及其影响,专门研究国民党史的著作也为数不少。即使如此,在已出版的国民党通史和专题研究著作中,同样未将商民运动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论述。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状况,据笔者分析大概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大陆学者较多地认为民众运动主要是共产党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的重要方式,作为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不可能重视或开展民众运动,所以大陆学者撰写的国民党史,论及北伐前后的这段历史,大都未将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作为重点,一般只是简单提及而未予深究。台湾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则大多强调当时共产党乘国民革命之机扩充自身实力,包括商民运动在内的民众运动都被共产党利用和破坏,没能按照国民党的预期设想顺利进行。其二,以往的许多研究者在主观上认为,商民运动没有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那样在国民革命时期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作用甚至不及妇女运动,所以不值得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应该承认,从实际情况看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规模与影响确实不及其他民众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商民运动没有学术价值。同时,尽管两岸学者对国民党史进行了多年的探讨,相关成果颇丰,但如果不对类似商民运动这样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也仍然会存在

着不小的缺陷。这种缺陷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所致,与研究者的思维定式和视野不开阔也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由于受传统思维定式的制约和影响,再加上对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考察不够,在国民党史研究中难免会存在着一些偏见,其中的一些定论也是值得推敲的。例如,过去的研究侧重于国民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党治史”,忽略其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演变的“治党史”,没有真正考察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结构、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仅从一些表面现象断定近代中国的国民党是一个强势的独裁政党。如果依据各方面丰富的史料深入考察国民党的“党治史”,可以发现国民党执政以后并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其控制只能及于政治表面,未能深入社会内部。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上述深入考察和分析,有学者提出了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的新结论,这对于全面认识近代史上国民党的真实面貌大有裨益。^{〔1〕}

即使以往对国民党“党治史”的研究较多,但由于长期忽略对商民运动的探讨,同样也影响到对近代不同历史时期国民党的认识,以为国民党始终都完全是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如果对商民运动加以考察,即可知晓国民革命期间的国民党并非如此。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认为“商民中有不革命者,有可革命者”,不革命者系指买办商人、洋货商人、中外合办银行商人等与帝国主义存在着密切关系者;另外,还认为由少数大商人操纵的商会,大多数“不独不参加革命,且为反革命”,所以应“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由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取代之。^{〔2〕}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实际上完全否认其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并且将买办资产阶级作为革命

〔1〕 有关本段内容的详细说明,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2〕 《商民运动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8—390页。

的对象,公开宣称自己是代表“全民”的利益。从其对商民“不革命”和“可革命”的划分,以及认定商会都是反革命的旧式商人组织等认识,还可说明当时的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革命政党,这显然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国民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缺乏对商民运动的研究,还导致对当时共产党的认识同样也会出现与客观历史事实不尽相符的某些误差。众所周知,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动员民众起来革命,许多相关的著作也都以较多篇幅对此加以论述。但由于很少论及商民运动,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共产党开展的民众运动从一开始就只是动员下层劳动人民,很少顾及商人,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实际上,当时的共产党对从事商民运动是比较重视的,而且对所谓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实施的具体策略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同样曾经通过了一个专门针对商人的《商人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许多方面与此前国民党制定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存在着相似之处,大体上也是将商人分为三类,即买办阶级、新兴企业家、中小商人,并确定商民运动的对象是中小商人,目的在于动员中小商人反对买办商人在民族运动中的妥协卖国行动,具体实施办法则是通过成立商民协会组织中小商人,改造原有的商会。^{〔1〕}由此可知,商民运动在当时其实是国共两党共同开展的民众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两党之间在商民运动中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只不过台湾学者在偶尔谈到这一问题时更强调的是冲突,尤其认为共产党是想方设法利用和破坏包括商民运动在内的民众运动。

然而不管怎样,无论是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应该忽略商民运动,否则就会妨碍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历史获得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除此之外,商民运动研究的薄弱,更直接影响到对近代中国商人和

〔1〕《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商人运动决议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档案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249—250页。

商会发展史的确切把握。因为商民运动的开展,相对而言对广大商人和商会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近20年来,商人和商会是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发展相当迅速的热门领域,现已有多部从整体上论述中国近代商会以及研究上海、天津、苏州等地方商会的专著出版,有关近代中国商人的几部著作也先后问世。但令人遗憾的是,查检2004年以前两岸学者出版的这些著作,却很少看到其中有专章对商民运动进行论述,这显然是不应有的一大缺陷。

不深入研究商民运动,对商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就很难以长时段的眼光看得更清楚,所得出的结论也很可能与客观史实不无出入。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商会诞生于清末,是工商业者最重要的新式社团组织,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对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受到社会各界包括官府的重视。但是,在1925年以后商民运动进行的一段时期,商会与新兴的商民协会并存,尽管都属于商人团体,在涉及商业及经济方面的某些事务时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由于具体成员构成的不同,特别是受国共两党制定的以商民协会改造甚至是取代商会这一策略的影响,两种商人团体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商民协会坚持要求撤销商会,国民党也曾公开予以支持,导致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由于对商民运动的忽略,致使研究者对这一时期商会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较少予以关注,也就不可能对商会在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下和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发展特点得到全面的认识。

不仅如此,对商民运动的忽略还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评价。例如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成立了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类民众团体进行整顿与改组。1930年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下令撤销商民协会,经过整顿改组的各级商会则陆续重新登记。以往的商会史著作大多数都认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和改组,是其执政以后推行以党治国,实施反动专制独裁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对商会等民间社团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如果对商民运动发展演变有所了解,即可发现改造和取消商会是国

民党早先即已确定的政策,并非执政之后实现一党专制的新策略。与先前所定商民运动方略所不同的是,在历经多年的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纷争之后,国民党最终承认了商会的合法性,转而撤销了商民协会,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调整商民运动和民众运动方略,实施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新政策的结果。对商会来说,通过改组之后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免除了商会自商民运动开展后多年面临的被解散取消的生存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商会经过合法斗争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显而易见,如果不结合商民运动进行长时段考察,仅仅只是孤立地看待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很难真正全面而客观地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

以上主要是从国民党史、中共党史以及商会史研究的几个方面,简略地说明了忽略商民运动对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所造成的缺陷及其影响;同时,也是从反面阐述了商民运动的实际规模与反响尽管在国民革命期间不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但同样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 近年来商民运动研究评介

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商民运动的研究开始予以重视,并陆续取得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下面,再对已有的相关成果加以介绍和评论,并由此更进一步说明加强商民运动研究,对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或许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迅速兴起的商会史研究的影响,较早引起国内外近代史学界部分学者注意的并不是商民运动本身,而是在商民运动期间,作为国民党推行此项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出现的新商人团体——商民协会。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即开始陆续有几篇

论述商民协会的论文发表,近些年来这方面的论文更是逐渐增多。^{〔1〕}但是,这些论文除个别之外,都较少从商民运动的角度进行探讨,大多主要是考察商民协会本身的情况,或是论述商民协会与国民党党治以及与商会之间的关系。

又如美国学者博士卓(Joseph Fewsmith)撰写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党、国与地方精英——1890至1930年上海的商人组织与政治》(*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85年),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上海商人团体的兴起与政治化过程、商人团体与党治的关系,并且有一部分篇幅涉及到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但主要也是以商民协会作为论述对象,其中商民协会与国民党党治是其侧重点。博士卓以上海的情况为例,认为商民协会的成立意味着国民党扩大了对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的控制权力,而商民协会的最终取消和商会的保留,则意味着党治的失败和国家对政党的胜利。^{〔2〕}其后,也有大陆学者将上海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争,视为国民党与政府之间的较量,这种

〔1〕 日本学者金子肇著有:《商民协会と中国国民党(1927—1930)——上海商民协会を中心に》,《历史学研究》(日)1989年第10期;《武汉における商民运动と国共合作——商民协会の动向を中心に》,《下关市立大学论集》(日),第34卷,第1号,1990年。中国学者张亦工发表了《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另有乔兆红:《论1920年代商民协会与商会》,《近代中国》(台北),第149期,2002年6月;彭南生、李玲丽:《略论大革命时期湖北的商民协会》,《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柏槐:《商民的利益集团:商民协会——成都与上海等地商民协会差异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赵利栋:《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的成立与取消及其与国民党党治之关系》,提交“北伐战争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75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2001年10月,湖北咸宁;赵利栋:《党、政府与民众团体——以上海市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为中心》,提交“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2年8月,北京;张志东:《国家社团主义视野下的制度选择:1928—1931年的国民党政府、商会与商民协会,天津的个案研究》,提交“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8月,上海。

〔2〕 该书共分三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为“上海商民协会与党治的兴衰”,这部分具体又分为全书的四、五、六三章,第5章的标题是“国民政府在上海:商民协会及建立党治的努力”,第6章的标题是“商民协会的瓦解与党治的失败”,由标题可知都是以商民协会为论述中心。第6章有中译文载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该文中译者将傅氏的名字译为约瑟夫·弗史密斯。台湾学者张力曾发表评论博士卓此书的文章,见台湾“国史馆”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5辑。

说法恐怕值得进一步推敲。另一位美国学者小科布尔的《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和法国学者白吉尔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张富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论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也程度不同地与本课题研究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还有一位美国学者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出版《中国民族主义革命(1923—1928)》(*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该书虽无有关商民运动的专门章节,但因为是论述这一时期国民革命的专著,有些地方同样也会多少涉及一些相关内容。另外,80年代中晚期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曾有多名博士研究生分别以20年代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但由于客观原因笔者目前尚未看到其中论述商人的论文。

不过,在以前海内外近代史学界着重考察商民协会的同时,台湾出版的某些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商民运动。如台湾“教育部”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建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即简略论及商民运动。该书第三篇第五章为“北伐期间之外交、财政与民运”,其中有一节专论北伐期间的民众运动,包括商民运动,由胡春惠撰写。本节内容胡春惠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在1984年的台湾政治大学学报第2期,并收入李云汉主编、高纯淑编辑的《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4册,由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又如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一书,在第4章中论述共产党从事民众运动时,也部分涉及到商民协会、商民运动等问题。但是,台湾学者专门探讨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论著仍付之阙如。

近些年来,国内才开始真正有学者对商民运动进行专题研究。青年学者乔兆红曾经撰写《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商民运动》一文^{〔1〕},其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以商民运动为主题,该文论述了商民运动的背景、产

〔1〕 该文系提交“北伐战争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75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2001年10月,湖北咸宁),后发表于《求索》2005年第9期。

生、发展、以及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等问题,是较早对商民运动进行专题探讨的论著,但在相关史料的搜集和某些问题论述的深度等方面,尚存在一定的缺陷。^{〔1〕}最近数年,乔兆红又以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内容为基础,发表了多篇有关商民运动的论文,对孙中山与商民运动、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商民运动的阶段性、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2〕}另外,近些年来,笔者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民运动研究”,作为该项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发表了一批相关的系列论文。^{〔3〕}

迄今为止以商民运动为主题,已正式公开出版而且较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只有中国大陆年轻学者冯筱才撰写的《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冯著”)。冯筱才称得上是近些年大陆年轻学者中研究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的佼佼者。其博士学位论文《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从理论、思路、方法、史料等许多方面都在原有近代中国商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商民运动是他博士毕业后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的专题,由于格外勤奋再加上多年的厚实积累,又很快得以推出这部新著。这里,值得对该著的具体内容及其学术贡献加以评介。

冯著共计6章,第1章为导论,主要是提出问题、回顾和分析文献,

〔1〕 乔兆红:《1920年代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03年5月。

〔2〕 乔兆红:《孙中山与中国商民运动》,《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文史哲》2005年第6期;《中国商民运动的阶段性分析》,《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论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江汉论坛》2007年第3期;《论1929年的沪商总会风潮》,《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4期;《中国商民运动的历史命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 本书作者发表的相关系列论文主要有:《再论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与改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论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北伐之前的国民党与民众运动》,《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

阐明全书主旨及篇章结构,并对论题与史料做了简要说明。作者特别强调应该关注革命党人发动民众运动的具体情境,对其民众动员工作的考察必须建立在特定的而且是变换着的时空背景上,不能空泛地仅从静止的意识形态角度,或者是一些静态的宣传文本出发。因此,冯著在第2章中论述商民运动如何发生时,从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后广东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动中做动态分析,探讨国民党在商团事件前对商人的认识、商团事件爆发后对商人态度的变化。这可以说是研究商民运动如何发生这个重要问题的一个新切入点。第3章则是讨论国民党“二大”前后商民运动的制度化及其内部权力斗争,主要从中共方面梳理其与商民运动的关系、国民党二大前后商民运动的制度化过程、商民运动控制权的转移等问题,由此使商民运动研究更为细化和更为深入。第4章论述的是商民运动在长江流域的推展及其出现的问题,侧重于商民运动发展之后形态的多样化、商民运动与工商冲突的关系、时事变化对商民运动的影响等。第5章主要讨论商会存废问题与商民协会的结束,重点考察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利益冲突、废除商会的争论及结局等。第6章是全书的结论。

谈到冯著的学术贡献,首先是该著对长期以来受到近代史学界忽略的商民运动,第一次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的全面,主要体现于对商民运动的产生、商民运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共与商民运动的关系、商民运动内部的各方关系、商民运动控制权的演变、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利益冲突、商民运动的结局及其影响等,都分别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其研究的深入,则表现在对上述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较为深入细致,不是限于一般性的简略介绍和平铺直述,而是力图通过对各方面相关因素的剖析,得出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观点。

其次,还值得肯定的是冯著在商民运动史料的挖掘和拓展方面,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该著征引了大量收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相关机构的档案文献资料,还有众多报刊杂志,尤其是地方报纸中的相关史料,可以说为研究者指明了查阅有关商民运动各方面资料的大致范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过去利用较少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商民部